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天涯孤舟

郁达夫传

罗以民 著

杭州出版社



天涯孤舟

郁达夫传

罗以民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罗以民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3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 - 80633 - 658 - 3

I.天 ... II.罗 ... III.郁达夫(1896—1945)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870 号

天涯孤舟

——郁达夫传

罗以民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杨清华 |
| ▼封面设计 | 李 莎 |
| ▼出版发行 |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
| ▼经 销 | 浙江省新华书店 |
| ▼激光照排 |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 |
| ▼印 刷 |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875 插 页 2 |
| ▼字 数 | 206 千字 |
| ▼版 次 |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633-658-3/K·42 |
| ▼定 价 | 20 .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汉末的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

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顓、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姚际恒、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

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 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 2000 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或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

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惟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自 序

郁达夫是一条“不系舟”，他出去了，终于没有回来。

在书桌前思考了许久，我写下了这四个字作为本书的题目：“天涯孤舟”。这四个字是沉重的。

他沐浴过五四的洗礼，永远是自由的精灵。

郁达夫生前便有人为其作传，迄今各种郁达夫传已不下于10部。今天郁达夫牺牲已50余年，人类亦进入了21世纪，如今我又为其作传，应该在新的平台上建构。我想至少应在以下7个方面较前人有所突破：

一、历史研究的责任首先就是要还历史于本来面貌，我将尽力说真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为尊者讳。这部传记的第一要旨就是写出一个真实的郁达夫。一部传记成功与否，不在于史家对传主主观评价的高低，而在于史家在传记中反映了多少历史真实，作出的判断是否符合实际，给后人是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智慧。据我的经验，传记作者的写作一般有三种“姿态”：一种是跪着写，他为传主的才华、勇气或业绩发出由衷的惊叹；一种是坐着写，他在与传主促膝谈心，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灵；一种是站着写，而且是站在奥林波斯山上，自命为无所不知的宙斯，视秦皇汉武拿破仑以下一切人等皆为世间之匆匆过客，指陈利害，痛下针砭，以告来者。史家此三种姿态，站尤难，其实跪也不易，所见功力自有不同。然以往一切官史乱拍马屁者不在少

数，就是跪错了地方。董狐不愿乱跪，就需要功力，更需要不怕死的勇气。那种视传记作者为传主之吹鼓手之看法更是史家之大忌。李广不封不可不同情，然李广杀灞陵尉乃挟嫌报复也不可不发之^①，此乃史笔。写史不求今人赞，惟恐后人骂！

二、以往的郁达夫传大多是一种单线式的大事记，这种研究的缺点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段脱离了森林的树木只能是无本之木，它是不会有生命的，会成为一段木头。一个“乾隆工”雕刻的紫檀笔桶，放在我的案前凄清孤冷，300年前它原是生长在南洋热带雨林中的一棵树，你能想像它当年在它原来的生存环境中是如何的生意盎然吗？“雨林”——对于一棵树的影响是多么重要。脱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无以读《沉沦》。离开了当时的“树林”，你将无法理解何以会有“《沉沦》热”（上个世纪20年代初，《沉沦》在中国能印行20,000余册，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在今天“性不再压抑了的”中国，谁还会似苏雪林那样去抨击郁达夫？当电视录相已经“开放”到如此地步，谁还要到文学中去“窥视”？《沉沦》还是那个《沉沦》，只不过今天“树林”变了。当然，不知道当时中国文坛之斗争，就不知郁达夫第一个于乱军中站出来推鲁迅为“中国作家第一人”之重要。

三、本传将展开郁达夫“童年史”的研究。郁达夫称自己的小说为“自叙传”，世人又称其小说为“自我暴露”，因此研究郁达夫的童年，结合郁达夫的自传、自述诗、日记、书信、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来研究其小说，又以其小说来反证其童年，开展一番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可以启发我们通过郁达夫之小说去研究郁达夫。陶潜的《桃花源记》世

^① 《汉书·李广传》。

代皆谓为“幻想小说”，陈寅恪独能于此“小说”中剥离出史实，西晋亡后，北方不少宗族乡党曾聚众凭险据守，自给自足，史籍称之为“坞堡”^①。能读史不足奇，能于虚中见实，又为我所用方为奇。

历史事件是由人去进行的，不研究人的行为动机，不考虑动机产生的原因，不分析原因的复杂性，那往往会对历史事件作出错误的判断。即使是谨慎的描述，那也是肤浅的。其小心翼翼，正因为其不知究里。史笔应该是深刻的。不能以古人之心为心，惟一的结果就是曲解古人。

四、郁达夫以小说名世，但其艺术成就最大的笔者以为是诗；其次为散文；第三为小说；第四为其文艺理论。郁达夫小说《沉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要大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五、为什么郁达夫去日本将郭沫若请回国来参加抗战，自己却一定要出国去南洋参加抗战？这首先于理不合。甚至在与王映霞分道扬镳后，他能将儿子郁飞托与在重庆的陈仪，自己却仍然不愿回国？甚至他被“征用”为日军翻译，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仍不想回国，本传将解答这个历史之谜。

六、以往的郁达夫传对郁达夫的私生活缺少研究（基本上是视而不见），这对还历史于本来面目是很不应该的。郁达夫的家庭生活对其影响甚大，决不可忽略。以往某些郁达夫研究者对郁达夫的个人生活采取“绕过去”的办法，可是这样既无法理解郁达夫的作品，而且对郁达夫的社会活动的解释更可能是南辕北辙。恩格斯曾经对那种貌似“清高”，反对在历史著作中写“私事”的人批判说：“如果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88 页。

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他甚至如此严厉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的西班牙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① 如果“绕开”郁达夫的“私事”去写郁达夫，那么写出的可以肯定说是一个假郁达夫。因为郁达夫是一个最“私事”化的作家。如果一定要“绕过去”，那么首先被“绕过去”的是史学的品格。而郁达夫发表的诗词、日记、自传、散文，还有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他自己就明明白白记载了那么多的私事，事实上使你根本无法“绕过去”。郁达夫与王映霞有共同的子女，还有各自的子女。如今这些昔日的孩子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然而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对帝王、对领袖不容回避，对普遍人也应如此。尤其我希望他们都能理解我。有的章节我也曾痛苦了几个月难以下笔，我想念驹先生可以为我作证。

此外，以往对印度尼西亚史以及印尼“二战”情况缺少了解，常使人们疑惑郁达夫何以给日军当翻译。本传亦将详加论述。

七、郁达夫之死是郁达夫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日本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在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本传将对铃木正夫的“宪兵班长 D 杀郁达夫”的结论提出质疑。一个缺少具体证人的证言无论他多么精致，在史学和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铃木正夫的结论提出已经 18 年了，中国史学界不应再保持沉默。谋杀郁达夫的日本宪兵肯定有，但不应该是 D，而应是另一个。本传对郁达夫被日本宪兵谋杀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98 页。

此外,本书因篇幅有限,自然应详略得当。笔者遵循的原则是凡有定评处略,凡遇疑难处详(试考辩之)。

笔者以为郁达夫虽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为反法西斯牺牲了的中国的烈士,他既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又是“文学革命”的闯将和小说家。他是五四的儿子,他从未背叛过五四精神。他身上有不少的缺点,但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真诚,最不会掩饰自己的人。

我将用这本传记展示自己的结论,同时也展示着自己的丑陋和无知。

本传的撰写得到了郁飞、郁峻峰、沈念驹、吕顺长先生和刘微亮、鲁继红女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本书中有关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的部分曾多次求教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周南京教授;又承蒙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国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陈子善先生冒酷暑审阅全稿并提出宝贵意见,作者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是我第一本用电脑写作的书。50岁之后学电脑困难可想而知,但我很幸运地认识了杭州浙大通策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立耀先生,他常常在下班后来帮我处理种种电脑的“疑难杂症”,而又不愿接受我的任何感谢,使我百感交集,值此出书之际,特记之不忘。

扬州 罗以民
于“八面受敌”寨
2003.8.4.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童年	(1)
第一节 家世	(2)
第二节 郁母陆氏和长兄郁曼陀	(4)
第三节 富春山水	(12)
第四节 富春人	(17)
第五节 九岁题诗四座惊	(27)
第二章 走出富阳	(31)
第三章 日本十年	(46)
第一节 “五校特约”的所谓“官费”	(46)
第二节 从“东京一高”到“东京帝大”	(56)
第三节 汉诗与服部担风	(90)
第四节 去北京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失败	(97)
第四章 作家生涯	(102)
第一节 《沉沦》大波与小说家郁达夫	(102)
第二节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	(117)
第三节 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坛鲁迅是权威	(119)
第四节 郁达夫与王映霞	(151)
第五节 以笔抗战	(201)

第五章 郁达夫失踪之谜?	(212)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当时的国情	(213)
第二节 日本的欺骗宣传	(217)
第三节 当时印尼华侨的“族群认识”	(225)
第四节 与日军周旋	(228)
第五节 让评价从人道主义出发	(247)
第六节 日本宪兵谋杀郁达夫原因新探	(252)
第七节 质疑铃木正夫	(257)
郁达夫简明大事年表	(267)
参考书目	(269)

第一章

童年

郁达夫本名华，又名萌生^①，郭沫若和郁达夫之长子郁天民皆说“达夫”是其字^②。

根据郁达夫的自传，郁达夫是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③出生在浙江杭州府富阳县满舟弄郁家老宅的，这一天公历是1896年12月7日，星期一。但是“满舟弄”这条巷名，被郁达夫留日时（1922年）在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监督处的“户籍证明书”上登记为“满家弄”，这条记录至今还保存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档案室里^④。然并非郁达夫弄错了自己祖居的巷

① 根据原富阳县档案馆档案新编93卷：1910年富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第二届毕业生名单，郁达夫的名字被登记为“郁萌生裴然”，可见郁达夫确实使用过“萌生”这一名字。

② 郁达夫：《郁达夫诗词抄》，郭沫若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郁天民1949年作《先君郁达夫行述》，见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中国香港港明书店1978年版，第164页。

③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郁达夫全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④ [日]小田岳夫、稻叶昭二：《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名。满舟弄在清末民初时又被呼为“满洲弄”，查《箫邑郁氏宗谱》^①可知此巷原名确为满家弄，郁达夫在日本登记的是此巷的原名。当年这是一条在富阳城墙脚下通往江边的狭窄的石板小巷。

第一节 家世

郁达夫自称是富阳人，然其先世本杭州府萧山县（今萧山市）永兴乡郁家山下村人。该村背山傍水。郁山突兀，两围低山环抱，小村如燕巢安居其中，距萧山临浦镇 2.5 公里。村前小河系永兴河支流，通浦阳江。据《箫邑郁氏宗谱》，郁家山原名燕窝山，元明之际郁氏祖先郁明笙自余杭迁来时始易此名。现谱是于 1947 年重修，其时郁达夫与其兄郁曼陀均已牺牲，但该谱连这样的事也均未记载，可见经抗战八年离乱，富阳的郁达夫家族已与萧山的本家失去了联系。该谱所载郁达夫三兄弟的情况均是根据民国三年（1914）版照录的。绍兴修志馆馆长董柏厓（萧山人）为该谱作序曰：“吾邑燕窝山郁氏为江南盛族。授姓姬周，代有令闻。宋室南渡，节度使绵公扈驾入浙，隐居余杭，数传而至明笙公，与其昆季徙宅来箫，厥后胤嗣寝繁，乃更名燕窝山为郁家山，建宗祠于山麓，奉鲁相郁贡为始祖。华裔远耀，宗秩延昌。”这个宋代的节度使郁绵于史无证，更罔论春秋之鲁相郁贡。中国民间宗谱，大抵考订粗率，且多喜攀附名门，此谱虽经修志馆然终不能免俗，记载郁氏家族第一世至第十三世均极为简略。所幸是，此谱记载郁氏家族富阳支系共 16 世倒较为详实可靠。

郁氏家族迁居富阳满家弄的第一代为郁义安。他的祖父郁

^① 该谱现由萧山永兴乡郁家山下村郁宏狄保存。

继堂“深于医术，其砭炳之妙，为时所重，子孙皆以医仕。”自郁义安传至13世郁宝鑫（郁达夫之曾祖父），字宝珍，号品三，又为“富阳名医”。第14世郁仰高（郁达夫之祖父），字圣山，也为“富阳名医”。至第15世郁企曾（郁达夫之父亲），字士贤，依然“兼行中医”。但郁氏3代均未进过学，称“儒医世家”颇不值。

第16世即郁达夫这一代。郁达夫出生时家境已每况愈下。其父郁企曾（1863—1900）6岁丧父，是由母亲戴氏一手养大。郁企曾早年设塾授课，但自己却连秀才也未曾中过，可知收入亦十分有限，只能兼行中医，聊补家用。其后来又在富阳县衙门当司事（相当于文书），死时年仅38岁。郁达夫时仅3岁。郁达夫上面还有两个兄弟。

郁达夫父亲在世时的经济收入主要有5个方面，即设塾、衙门薪俸、行医、庄书和田产。郁达夫与孙荃之长子郁天民（即于听，已故）说：郁达夫出生时郁家有“祖遗的一部半‘庄书’”。“‘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的田赋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之下的行政区域分成若干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时风行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中户收取所谓‘秋丰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也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